

中國“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譯介研究

손제* · 노정은**

〈目 次〉

1. 引言
2. 譯介的背景
3. 譯介的狀況
4. 譯介的途徑
5. 譯介的傾向
 - 1) 左傾文藝
 - 2) 弱勢民族文學
6. 結語

1. 引言

中國“十七年”(1949-1966)¹⁾時期的外國文學譯介活動，並不像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一片空白”，而堪稱“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譯業興盛、譯人衆多、譯著繁富、譯筆精湛的繁榮景象”²⁾。實際上，建國後“十七年”時期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數量上並不亞於清末民初時期³⁾，但是中外學界對

* 주저자, 건국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 과정

** 교신저자, 건국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1) “十七年”(十七年文學)，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開始，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歷程，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

2) 周發祥，『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十七年及“文革”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104頁。

3) 根據『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統計，1949-1966年共譯介外國文學作品5442部。參見劉立勝，〈翻譯規範與譯者行為關係研究的社會學途徑——以晚清與建國後十七年間文學翻譯為例〉，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154頁。不少於清末民初時期所譯介的4974種文學作品。參見李金樹，〈“十七年”(1949-1966)翻譯研究：回顧與展望〉，『外國語文研究』第3卷第3期，2017年，65頁。

這一時期的關注程度一直相對較低。其原因在於，“十七年”時期的外國文學譯介活動是在相對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下進行的，“文學譯介主要體現為一種政治關係”⁴⁾。政治意識形態對“十七年”時期譯介活動的制約，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但是，無論政治意識形態是否介入到譯介活動之中，譯者都無法將原著絲毫不差地展現給本國的讀者。就如那句西諺所說的“譯者即逆者”⁵⁾，不管譯者怎樣努力地追求忠實，也始終無法制造出一個跟原著一模一樣的譯文。

目前，中韓兩國學術界關於中國20世紀以來韓國文學譯介活動的研究範圍主要集中於20世紀30、40年代和1992年中韓建交後這兩個時期，相關文獻、書目整理得比較詳細，特別是中韓建交之後韓國文學譯介的研究已初具規模，不僅有對具體文本的研究，還包括對隱藏在譯介活動背後的操控因素的分析。但是，關於從新中國成立後到建交這段時期的研究仍是鳳毛麟角，尤其是建國後“十七年”時期的韓國文學譯介活動的研究。從中國學術界來看，在定義韓國文學時，就已經帶有一定的政治的、國別的性质：在1949年以前，中國學術界習慣將其稱作“韓國文學”；而1949年以後，在南北韓分裂的狀態下，中國學術界受到當時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同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北韓(中國稱“朝鮮”)為中心分別稱其為“朝鮮文學”和“南朝鮮文學”，這一命名一直沿用到1992年中韓建交為止；中韓建立外交關係後，隨著兩國文化交流不斷加深，出於相互尊重和認可，中國學術界又逐漸開始使用“韓國文學”這一命名⁶⁾。但是從韓國的角度來看，“韓國文學”也就是韓國學術界所定義的“國文學”，它是指“以歷史上各個時期韓國人的生活為創作對象，通過與那個時代相對應的特殊性的表達方法——正音·假字·漢文等，進而形象地創造出來的一種文學”⁷⁾。換句話說，在任何時期“韓國文學”(Korean Literature)是一個統一的概念，不存在南北韓文學上的對立，雖然

4) 朱棟霖,『中外文學比較史(1949-2000)』下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174頁。

5) 錢鍾書曾把這句“西諺”翻譯成“翻譯者即反逆者”。參見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舊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63頁。

6) 中國學術界關於韓國文學概念的具體論述參見崔雄權,〈試論韓國朝鮮文學的概念及其文化審美特征〉,『東疆學刊』第3期,2009年。

7) 정병욱,〈국문학의 개념규정을 위한 제언〉,『국문학산고(國文學散稿)』,신구문화사,1959年,57頁。

1948年以後韓半島迫於冷戰格局的威勢，建立起南北韓兩個政權，但文學上的分裂只不過是“韓國文學”從這一時期開始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可以簡單地看作兩個國家的文學。

研究中國建國後“十七年”時期的北韓文學譯介活動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可以了解到韓國文學在分裂初期，作為其一部分的北韓文學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能夠彌補這一時期韓國文學譯介活動研究上的空白，完善中國20世紀韓國文學譯介活動的整體脈絡。考慮到韓國的立場，本文在進行闡述時，涉及到的具體學術用語將以韓國學術界的表述習慣為準，如北韓(朝鮮)、韓國戰爭(抗美援朝)等。此外，在引用中國的相關學術資料時，將直接使用原文，而在關於這一時期北韓文學譯介問題的中國資料原文中提到的“朝鮮”實際就是指北韓，而非歷史上的朝鮮王朝。

如上文所述，中國“十七年”時期的外國文學譯介活動是在一種國家敘事的話語進行的，因此受到當時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韓國文學具體來說南韓文學完全排斥在譯介活動之外，處於一種禁錮的狀態之下；相反，北韓由於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屬於同一陣營，所以這一時期北韓文學的譯介活動則表現得相當的活躍。操縱學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⁸⁾的翻譯理論認為“翻譯就是對原語文本的改寫”，“重寫即操縱，並為權力服務⁹⁾”。在中國“十七年”時期的北韓文學譯介活動中，受到當時冷戰時代話語的影響，政治意識形態占有絕對的優勢，形成一種從屬於政治的國家敘事。因此，本文在分析“十七年”時期的北韓文學譯介活動時，以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基調，首先，對影響這一時期中韓兩國文學活動的時代話語和中國的外國文學譯介趨勢進行概括，以此掌握譯介活動的背景；其次，

8) 英國翻譯理論家Hermans(1985)最早把“操縱”用於理論翻譯理論研究，指出“從目標文學的觀點來看，所有的翻譯都意味著為某種目的對原文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操縱”。這一觀點被認為是翻譯理論操縱學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的雛形。之後出生於比利時的美籍著名比較文學專家和翻譯理論家André Alphons Lefevere (1985)提出把翻譯研究納入多種“重寫”(rewriting)和“折射”(refraction)研究的範疇內，後來他在『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翻譯的操縱觀，標志著操縱學派的正式形成。

9) André Alphons Lefevere,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5頁。

整理這一時期的譯介狀況和途徑，彌補當前相關研究資料上的不足，為具體分析譯介活動提供條件；最後，分析這一時期在國家敘事話語下形成的譯介傾向，並討論譯介傾向對譯介活動產生的影響。

2. 譯介的背景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國民政府慘敗，逃亡到隔海相望的台灣。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取得了勝利，並建立起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期，隨著二戰的結束，德意日法西斯國家宣布無條件投降，殖民帝國主義體系徹底瓦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戰後社會經濟急需復蘇，亞非拉地區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不斷高漲，在世界範圍內，從意識形態上分野為以蘇美兩大國為首的東、西兩大陣營。

在險峻的國際鬥爭環境下，對於剛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而言，必須要在蘇美兩大陣營之間做出選擇，以鞏固和維護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提出新中國外交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倒”的方針：

“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¹⁰⁾

另一方面，新中國政權建立不久，國內尚有大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制度和思想殘餘有待消除。在這一情況下，新中國政府在建國後推行了一系列的“除舊布新”的國家政策，如1950年開始實施的以改革土地私有制，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為目的的“土地改革”政策，1951年秋推行的整頓教育界、文藝界、知識界，樹立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至1956年期間對農業、手

10)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473頁。

工業、資本主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運動，而在這些新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實際上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想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

在新中國不久後的同一時期內，與中國領土接壤的韓半島上爆發了韓國戰爭，突如其來的戰爭再一次把新中國卷入到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之中，對於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來講無疑是嚴峻的挑戰。最終應北韓政府的請求，中國人民志願軍決定出軍作戰，直至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三年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與北韓人民軍並肩作戰，共同抵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

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十七年文學”更多地強調文學作品的意識形態，呈現出政治凌駕於文學性，文學創作帶有政治上的盲從性的特點。具體表現在，這一時期城市文學稀缺，原“解放區”文學占主導地位，作品創作以“歌頌”、“回憶”、“鬥爭”為主要題材，即“歌頌人民、黨、領袖和社會主義，回憶過往的困難和戰爭，與舊思想、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作鬥爭”，而這種將題材的重要與否作為衡量作品價值的標準，嚴重地束縛了作家創作文學作品的的能力。這一時期的小說作品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帶有明顯的格式化傾向，突出高大化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再是有著七情六欲的凡人，被塑造成不具備人性醜陋一面的完美化身，然而一味地強調英雄人物的崇高政治理想，也使其逐漸淪落為代表社會主義先進階級的政治符號。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¹¹⁾成為約束這一時期文學活動的重要綱領，相比文學自身的藝術性，更多地強調文以載道的社會功能，文學的秩序被規定在政治意識形態範疇內。因此“十七年”時期，在涉及到外國文學作品譯介時，也表現出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基本取向的特點。首先，蘇俄文學作品的譯介占有絕對的優勢。毫無疑問，無論從國際關係還是意識形態考慮，蘇俄既是新中國在國際陣營中的重要友邦，也是社會主義的先進國，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效仿的對象。所以建國以後，蘇俄文學作品作為首屈一指的文學經典被大量地譯介到中國，據統計，“從1949到1966年的17年間，外國文學翻譯書籍總印數不低於

11)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指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發表，內容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結論兩部分，1953年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億冊，平均每種2萬冊。其中蘇俄文學作品遙遙領先，占‘十七年’間翻譯總量的一半以上”¹²⁾，“在新中國的最初7年裏，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譯出版了196種蘇俄作品。尤其以蘇聯作品的譯介最為詳盡、及時”¹³⁾。

舉世公認的蘇俄文學作品，如『葉普蓋尼奧·涅金』、『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父與子』、『前夜』、『欽差大臣』、『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大雷雨』等，在這一時期都有譯本或重譯本出版。正如周揚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提到：“蘇聯的文學藝術作品在中國人民中找到了愈來愈多的千千萬萬的忠實的熱心的讀者；青年們對蘇聯作品的愛好簡直是狂熱的。他們把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當作自己學習的最好榜樣，巴甫連柯的『幸福』，尼古拉耶娃的『收穫』，阿紫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作品都受到了讀者最熱烈的歡迎。他們在這些作品中看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人物，一種具有最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品質的人物。”¹⁴⁾“十七年”時期大量蘇俄文學譯介作品的出版，一方面可以作為建國以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本土文學作品的創作和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提供了範本。

其次，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取舍標準不僅表現在譯介外國文學作品時，對於國別的選擇上，同樣在對某一國家的具體作品選擇時，也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即便是占有翻譯絕對優勢的蘇俄文學作品也無法避免這一標準，所以，在這一時期譯介的蘇俄文學作品中，一些優秀的非主流作家，如葉賽寧、勃洛克、左琴科等作家的文學作品則被排除在了譯介的範圍之外。但也因此，使得一部分歐美國家的優秀文學作品能夠被譯介到中國。這部分歐美國家文學作品的譯介集中在古典

12)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止，我國翻譯出版的蘇聯(包括舊俄)文學藝術作品共3526種，占這個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藝術作品總數65.8%強，總印數字82005000冊，占整個外國文學譯本總數74.4%強。”參見卞之琳，〈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文學評論》第5期，1959年。

13) 宋炳輝 呂燦，〈20世紀下半期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及其影響〉，《中國比較文學》第3期，2007年，59頁。

14) 『蘇聯人民的文學』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203頁。

主義作品和反資本主義的進步作品，如英國的莎士比亞、蕭伯納，美國的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和德萊塞的作品。其原因在於莎士比亞、蕭伯納的作品屬於歐美文學的經典作品，且不會對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帶來危害，德萊塞於1945年加入美國共產黨，馬克·吐溫是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們的作品則被視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文學。

在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的外力作用下，建國後“十七年”的中國文學以及譯介都表現出了政治凌駕於文學性的特點。那麼，“十七年”期間的北韓文學譯介又會表現出什麼樣的傾向呢？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無論是中國的本土文學還是譯介文學在一時期都受到了來自於文學外部因素的影響，而當涉及到譯介問題時，不僅要對目的語的文學話語有所掌握，包括出發語的文學話語也會對譯介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在討論“十七年”時期的北韓文學譯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這一時期韓國文學的整體文學話語進行一下梳理。

1945年8月15日，韓半島從長達35年之久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就在韓半島人民還沉浸在光復的喜悅中時，分裂的痛苦卻接踵而至。美軍和蘇聯軍分別進駐三八線南北兩側，並在南北兩地分別支持建立起大韓民國(Republic of Korea)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即南北韓兩個政權。南北分裂實際上是以美蘇為首的冷戰格局的產物，但是，比起分裂更大的悲劇是不久後在1950年韓半島再次點燃的戰火，韓國戰爭的爆發使得韓半島幾乎變成一片廢墟，半島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在這樣的環境下，韓半島上的文學創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分裂”成為韓國文學新的命題。“分裂”是指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以後，從政治的角度上在韓半島建立起南北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政權。因此，本來屬於同源的韓國文學也被人為地從意識形態上劃分成南與北兩個部分，大部分懷著無產階級理想，特別是30年代的卡普系作家如韓雪野、李箕永等選擇去北韓從事文學活動，而相反，有著自由民主信念的作家則留在了韓國。南北韓作家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下，一方面不可避免地逐漸形成觀念與認識上的對立，而另一方面，由於地域上的隔離而形成的同一民族間的離散狀態，又激發了尋求民族自我認同的心

理。這樣一來，同民族間的離散與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成爲這一時期韓國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其次，“戰爭”作爲書寫的對象，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文學作品中。1950年開始的韓國戰爭，在愛國主義熱情的激勵下，南北兩側都有大批的成名作家和少壯作家作爲戰地作家趕赴戰場，同時也創作了大量的戰地題材的文學作品。然而，持續3年的韓國戰爭給半島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親人亡故，流離失所，曾經的家園已經變成了廢墟，所有的生活都需要重建，面對眼前這些支離破碎的場面，由此而產生的對於戰爭復雜的情緒，也不經意地表現在他們創作的文學作品之中。

對於北韓文學自身而言，這一時期圍繞著“分裂”與“戰爭”產生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成爲中國在譯介北韓文學作品時主要選擇的對象。但是如前文中所提到的，由於新中國在建國之初，所奉行的“一邊倒”的外交原則，以及世界範圍內美蘇兩個陣營的冷戰對立狀態。因此，在“十七年”期間中國政府與南韓政府不僅在外交上斷絕往來，包括譯介在內的文化交流也處於一種禁錮的狀態，這種禁錮狀態的產生實際上是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化領域嚴重的干涉。從某種層面來講，“十七年”時期中國主動地將南韓文學排除在本土文學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但相反，由於意識形態上的一致，以及韓國戰爭以來形成的中國和北韓之間的友誼，也使得這一時期的北韓文學作品譯介活動變得十分活躍。

3. 譯介的狀況

在中國“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的譯介活動表現得十分活躍。根據『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¹⁵⁾中所列的書目，這一時期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多達48部，而且體裁形式豐富，包括小說、詩歌以及劇本等。所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多數爲成名作家的作品，如韓雪野、李箕永、宋影等，但也有一部分少壯作家的作品，具體譯作狀況如下：

15) 『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和提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金史良, 李烈譯, 『同志們, 看見海了!』, 北京, 文藝翻譯出版社, 1951年。
- 金史良, 李箕永, 金波譯, 『英勇戰鬥的朝鮮人民』, 上海, 新華書店, 1951年。
- 金史良, 李烈譯, 『隊伍向著太陽』, 北京, 青年出版社, 1952年。
- 韓雪野, 李北鳴, 馬超群, 韓正莊譯, 『狼』, 上海, 文光書店, 1953年。
- 韓雪野, 李烈譯, 『離別』, 上海, 文光書店, 1953年。
- 李泰俊, 李烈譯, 『高貴的人們』, 上海, 平明出版社, 1953年。
- 李園友, 陶冰蔚譯, 『盼望的一天』,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年。
- 韓雪野, 金波譯, 『大同江』, 上海,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1954年。
- 洪建, 朝鮮文化宣傳省對外文化聯絡局譯, 『“一二一”高地——傷心嶺』,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年。
- 黃健, 張祿林譯, 『火線』,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年。
- 韓雪野, 李烈譯, 『大同江』,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5年。
- 韓雪野, 柳樹仁譯, 『在軌道上』, 上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5年。
- 韓雪野, 田得萬譯, 『狼(劇本)』, 平壤, 外國文出版社, 1956年。
- 洪淳哲, 冰蔚譯, 『阿媽妮』,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 『春香傳』, 冰蔚, 張友鸞譯,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 李鍾淳, 崔健, 冰蔚譯, 『不能再過那種日子』, 上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6年。
- 李箕永, 蔡志清譯, 『江岸村』,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年。
- 韓雪野, 柳基鴻, 徐萬一譯, 『狼』,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 宋影, 碧俠譯, 『江華島』, 北京, 外國文學出版社, 1956年。
- 李箕永, 李根全, 關山譯, 『故鄉』, 上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7年。
- 韓雪野, 李烈譯, 『歷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年。
- 李箕永, 冰蔚, 趙仁傑, 許文湖譯, 『土地』,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年。
- 崔曙海, 辛非譯, 『出走記』,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58年。
- 韓雪野, 馬超群譯, 『狼』,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年。
- 韓雪野, 李烈, 曲本進譯, 『大同江』,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 韓雪野, 武超, 蔡志清, 許文湖譯, 『黃昏』,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
- 崔曙海, 李圭海譯, 『崔曙海小說集』,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 韓明泉, 冰蔚譯, 『北間島』,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 李箕永, 冰蔚, 趙仁傑, 許文湖譯, 『土地』,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 樸世永, 朝鮮作家同盟委員會譯, 『不死鳥』,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 千世峰, 李英愛譯, 『戰鬥的村民』,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
- 李箕永, 李根全, 關山譯, 『故鄉』,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
- 黃健, 冰蔚譯, 『蓋馬高原』,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0年。
- 『春香傳』, 冰蔚, 木弟譯,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0年。
- 韓雪野, 冰蔚譯, 『塔』,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0年。

- 權正龍, 何文譯, 『父親的控訴』,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0年。
樸雄傑, 江森譯, 『祖國』,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3年。
千世峰, 冰蔚譯, 『白雲繚繞的大地』,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3年。
趙白嶺, 張琳譯, 『紅色宣傳員』,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3年。
尹世重, 古文濤 金聖哲 高岱譯, 『在考驗中』,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李根榮, 江森譯, 『第一次收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1年。
樸赫, 江森譯, 『朝鮮的母親』,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千世峰, 李英愛譯, 『戰鬥的村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李東春, 周必忠譯, 『回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樸世永, 李佩綸 楊永驪譯, 『密林的歷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崔榮化, 張琳譯, 『火炬』,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樸靈寶, 魯定譯, 『朝霞』,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樸八陽, 王文光譯, 『黃海之歌』,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宋影, 王文光譯, 『江華島』,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金載浩, 北大朝鮮語科教研室譯, 『襲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6年。

從原著作家來看, 韓雪野的作品被譯介了7部, 是這個時期譯介作品最多的作家, 在他被譯介的作品中, 如『大同江』、『狼』更是被多次重譯。韓雪野在北韓文壇有著重要的地位, “是當代朝鮮著名的老作家, 傑出的社會活動家, 朝鮮作家同盟的委員長, 朝鮮擁護和平全民族委員會的委員長。他的文學活動與朝鮮的人民文學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他以自己豐富而卓越的文學創作, 反映了朝鮮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鬥爭和社會生活”¹⁶⁾。在其他作家中作品被譯介較多的是李箕永和金史良的作品, 其中李箕永的作品被譯介了3部, 金史良的作品被譯介了2部, 另有一部為兩人合著作品, 李箕永的作品中, 『故鄉』和『土地』也被重譯出版過。

從作品主題來看, “十七年”時期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主要表現為“戰爭”、“歌頌”和“鬥爭”這三個方面, 與同時期中國本土文學的主流題材基本保持一致。首先, 以“戰爭”為主題的作品集中表現了1950年爆發的韓國戰爭, 如韓國戰爭中戰地作家所記錄的隨軍日記『同志們, 看見海了!』、展現韓國戰爭中中國和北韓友誼關係的『高貴的人們』、從農村的變化來表現韓國戰爭的『不能再過那種日子』和『江岸村』、以及正面直接描寫韓國戰場的『襲擊』等。除了表現韓國戰爭

16) 韓雪野, 李烈譯, 〈關於作者〉, 『大同江』, 作家出版社, 1955年, 1頁。

外，也有回憶抗日戰爭的小說，如『戰鬥的村民』等。其次，以“歌頌”為主題的作品主要有，歌頌北韓領袖金日成的『歷史』，歌頌北韓母親形象的『阿媽妮』和『朝鮮的母親』，歌頌北韓女英雄的『朝霞』和『黃海之歌』，歌頌北韓少年團的『盼望的一天』和『隊伍向著太陽』等。最後，以“鬥爭”為主題的作品主要分為表現韓國光復前和光復後兩個時期的階級鬥爭，其中表現光復前的作品以反映北韓各階層與日本帝國主義間的階級鬥爭為主，如反映農民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階級鬥爭的『故鄉』，反映工人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階級鬥爭的『黃昏』，另外，表現光復後的作品則以反映北韓工農階級與封建殘餘制度以及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階級鬥爭為主，如以北韓建國後土改為主要內容，反映農民階級與殘餘封建階級鬥爭的『土地』和『第一次收穫』，反映工人階級與保守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之間階級鬥爭的『在考驗中』，反映北韓人民與美帝國主義之間階級鬥爭的『大同江』等。

4. 譯介的途徑

作者	譯著	原著	譯者
金史良	『同志們，看見海了！』，北京，文藝翻譯出版社，1951年	〈바다가 보인다〉，『로동신문(勞動新聞)』，1950年	李烈
金史良 李箕永	『英勇戰鬥的朝鮮人民』，上海，新華書店，1951年	〈영용전투적 조선인민〉	金波
金史良	『隊伍向著太陽』，北京，青年出版社，1952年	〈대오는 태양을 향하여〉，『문학예술』，1950年	李烈
韓雪野	『狼』，上海，文光書店，1953年	〈송냥이〉，『문학예술』 제4권 제1호，1951年	馬超群 韓正莊
韓雪野	『離別』，上海，文光書店，1953年	〈전별〉，『선집』8，1951年	李烈
李泰俊	『高貴的人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	〈고귀한 사람들〉，『고향길』，평양，문화전신사，1952年	李烈
李園友	『盼望的一天』，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	『기다리던 날』，평양，민주청년사，1952年	陶冰蔚
韓雪野	『大同江』，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	『대동강』，평양，문예총출판사，	金波

	社, 1954。	1952年	
洪建	『“一二一”高地—傷心嶺』,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年	朝鮮文化宣傳省對外文化聯絡局	
黃健	『火線』,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年	『화선』, 평양, 조선국립도서출판사, 1953年	張祿林
韓雪野	『大同江』,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5年	『대동강』, 『로동신문(勞動新聞)』 4月23-29日刊, 1952年 『대동강』, 평양, 문예총출판사, 1952年	李烈
韓雪野	『在軌道上』, 上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5年	『궤도 위에서』	柳樹仁
韓雪野	『狼』, 北京, 外國文學出版社, 1956年	〈승냥이〉, 『문학예술』 제4권제1호, 1951年	田得萬
洪淳哲	『阿媽妮』,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어머니』,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4年	冰蔚
	『春香傳』,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춘향전』,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4年	冰蔚 張友鸞
李鍾淳 崔健	『不能再過那種日子』, 上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6年	『다시는 그렇게 살 수 없다』	冰蔚
李箕永	『江岸村』,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年	〈강안 마을〉, 『조선문학』 7, 8月號, 1954年	蔡志清
韓雪野	『狼』,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6年	〈승냥이〉, 『문학예술』 제4권제1호, 1951年	柳基鴻 徐萬一
宋影	『江華島』, 北京, 外國文學出版社, 1956年	『강화도』, 평양, 外國文出版社, 1956年	碧俠
李箕永	『故鄉』, 上海, 新文藝出版社, 1957年	『고향』,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5年	李根全 關山
韓雪野	『歷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年	『역사』, 평양, 조선작가출판사, 1954年	李烈
李箕永	『土地』,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年	『땅』,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5年	冰蔚 趙仁傑 許文湖
崔曙海	『出走記』,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58年	『탈출기』	辛非
韓雪野	『狼』,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年	〈승냥이〉, 『문학예술』 제4권제1호, 1951年	馬超群

韓雪野	『大同江』,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대동강』, 평양, 문예총출판사, 1952年	李烈 曲本進
韓雪野	『黃昏』,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	『황혼』,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5年	武超 蔡志清 許文湖
崔曙海	『崔曙海小說集』,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최서해선집』	李圭海
韓明泉	『北間島』,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북간도』, 평양, 문화전신사, 1948年	冰蔚
李箕永	『土地』,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땅』,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5年	冰蔚 趙仁傑 許文湖
樸世永	『不死鳥』,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年	『불사조』, 1947年	朝鮮作家 同盟委員會
千世峰	『戰鬥的村民』,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	『싸우는 마을 사람들』, 평양, 문예총출판사, 1953年	李英愛
李箕永	『故鄉』,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	『고향』,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5年	李根全 關山
黃健	『蓋馬高原』,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0年	『개마고원』,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6年	冰蔚
	『春香傳』,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0年		冰蔚 木弟
韓雪野	『塔』,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0年	『탑』,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6年	冰蔚
權正龍	『父親的控訴』,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0年	『아버지의 수기』, 평양, 조선문학, 1956年	何文
樸雄傑	『祖國』,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3年	『조국』, 평양, 조선문화예술총동맹출판사, 1963年	江森
千世峰	『白雲繚繞的大地』,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3年	『안개 흐르는 새언덕』, 평양, 조선문학예술총동맹출판사, 1960年	冰蔚
趙白嶺	『紅色宣傳員』,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3年	〈붉은 선동원〉, 根據『朝鮮電影』1963年3月號譯出	張琳
尹世重	『在考驗中』,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시련 속에서』, 평양, 조선문학예술총동맹출판사, 1963年	吉文濤 金聖哲 高岱

李根榮	『第一次收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1年	『첫 수확』,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7年	江森
樸赫	『朝鮮的母親』,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조선의 어머니』, 평양, 조선문학, 1958年	江森
千世峰	『戰鬥的村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싸우는 마을 사람들』, 평양, 문예출판사, 1958年	李英愛
李東春	『回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4年	『산울림』, 1961年	周必忠
樸世永	『密林的歷史』,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밀림의 력사』, 평양, 조선문학예술총동맹출판사, 1962年	李佩綸 楊永驪
崔榮化	『火炬』,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화불』這裏的二十九首詩, 除『火炬』、『千裏馬駒』, 朝鮮的氣概』、『印度尼西亞』三首外, 其餘都選譯自崔榮化的詩集『翅膀』(날개)。	張琳
樸靈寶	『朝霞』,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아침 노을〉, 『조선문학』7月號, 1963年	魯定
樸八陽	『黃海之歌』,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황해의 노래』, 평양,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60年	王文光
宋影	『江華島』,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강화도』, 평양, 外國文出版社, 1956年	王文光
金載浩	『襲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6年	1966年。『습격』, 根據조선 인민군연극 극장作者手稿譯出。	北大朝鮮語科教研室

在譯介途徑方面, 相比30年代韓國文學譯介中存在大量的通過日語譯本轉譯到漢語譯本的重譯現象, “十七年”時期譯介北韓文學的途徑比較單一, 全部都是從韓語原著直譯到漢語。而且這一時期的譯介相當地具有時效性, 其中, 在原著出版當年就進行譯介並出版發行譯著的有宋影的『江華島』、趙白嶺的『紅色宣傳員』和樸雄傑的『祖國』3部作品。而譯著與原著出版發行時間相隔較久的只有樸八陽的『黃海之歌』(5年)、千世峰的『戰鬥的村民』(6年)、樸赫的『朝鮮的母親』(6年)、韓明泉的『北間島』(11年)、樸世永的『不死鳥』(12年)等5部作品。其他譯著則與原著出版發行時間相隔都很近, 譯著與原著出版時間相隔1年的有4部, 相隔2年的有10部, 相隔3年的有4部, 相隔4年的有5部。可以看出, “十七年”時期絕

大部分的譯作都是在原著發表4年之內就進行了譯介，其中更多的是在原著發表2年之內中國國內就出版發行了譯著。從這一點上足以說明當時中國學界對北韓文學的關心程度，以及對北韓文學界發展狀況了解的深度。

在譯者方面，“十七年”時期的譯者都能夠熟練掌握韓語，所以在譯介路徑上不再需要通過其他語言的譯本進行重譯，雖然譯作中或多或少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能夠直接地接觸到原著，大大地提高了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和認識。在眾多的譯者中，譯介作品最多的是冰蔚，“十七年”期間由冰蔚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共11部，其中更包括這一時期唯一的一部古典小說『春香傳』。冰蔚(1930-2013)¹⁷⁾從小在平壤長大，畢業於金日成大學。建國初期回國，並進入外交部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翻譯工作，在工作之餘，冰蔚利用業餘時間翻譯出版了多部北韓著名的文學作品，成為“十七年”時期最活躍的北韓文學譯者。而冰蔚出於對政治工作的考慮，也難免會影響到他對譯介文本的再現。此外，冰蔚還譯介過介紹北韓文學的文章，如韓雪野(1960)所作的『解放以來的朝鮮文學遍地開花』¹⁸⁾，為當時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更廣的視角去了解北韓文學。

在出版方面，“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作品的譯著主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兩家出版社進行出版發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3月在北京成立，屬文化部領導。馮雪峰時任社長兼總編輯，由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和三聯書店總管理處調來部分人員組成基本幹部隊伍。在1953年至1958年、1960年至1969年期間以副牌“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圖書，所以從1955年到1957年發行的『大同江』、『阿媽妮』、『春香傳』、『狼』、『歷史』、『土地』等譯著的出版

17) 冰蔚(1930-2013)，本名陶炳蔚，筆名冰蔚，祖籍山東。由於父親早年應招到北韓工作的原因，冰蔚出生在北韓平壤，並且在那裏先後就讀於華僑小學、日本中學、金日成大學。建國初期回國，1951年進入外交部，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翻譯工作。如1969年國慶二十周年之際，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來華參加國慶慶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崔庸健並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這次談話就是由陶炳蔚擔任翻譯工作的。1973年調入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任亞太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韓國、日本問題。1992年中韓建交後，為加強兩國交流工作，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韓國國際交流財團共同主辦了“中韓未來論壇”，每年輪流在中國和韓國舉行，陶炳蔚參加了多屆論壇交流活動。文革前，陶炳蔚在工作之餘，利用業餘時間翻譯出版了『春香傳』、『土地』、『蓋馬高原』、『白雲繚繞的大地』等多部北韓著名的文學作品，成為為數不多的北韓文學的翻譯權威。2013年，因病逝世。

18) 韓雪野，冰蔚譯，〈解放以來的朝鮮文學遍地開花(特約稿)〉，《世界文學》第8期，1960頁。

社都是作家出版社，從1958年到1960年發行的『狼』、『大同江』、『崔曙海小說集』、『北間島』、『土地』、『不死鳥』、『蓋馬高原』、『春香傳』等譯著的出版社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而從1963年到1966年發行的『祖國』、『白雲繚繞的大地』、『在考驗中』、『第一次收穫』、『朝鮮的母親』、『戰鬥的村民』、『密林的歷史』、『火炬』、『朝霞』、『黃海之歌』、『江華島』、『襲擊』等譯著的出版社又變成了作家出版社。但實際上這些譯著所屬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只不過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特定時期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發行圖書而已。另一方面，上海文藝出版社於1952年6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由郭沫若主持的群益出版社、俞鴻模的海燕書店和任宗德主持的大浮出版公司合並起來的新文藝出版社，後來又有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相繼並入組建而成。“十七年”時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北韓文學譯著作品有5部，在數量相比人民文學出版社要遜色得多。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都是由中國政府運營的出版機構，因此，在當時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無論出版中國國內的文學作品還是外國文學的譯介作品都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另一方面，“十七年”時期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的原著出版機構主要是朝鮮作家同盟出版社和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出版社。其中，作家同盟出版社是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出版社的前身。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出版社（簡稱“文藝總出版社”）1961年3月2日由國立文學藝術書記出版社、作家同盟出版社、朝鮮音樂社、朝鮮美術社等聯合組建而成，是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¹⁹⁾中央委員會下屬的出版社。此外，還有一部分譯介作品的原著是在北韓『勞動新聞』上刊載的作品，『勞動新聞』創立於1945年11月1日，當時名為『正路』，1946年9月改名為『勞動新聞』，是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由勞動新聞社負責出版。該報在北韓社會政治生活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並發揮著不可代替對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實際上在北韓國內出版時就已經接受過相關部

19) 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成立於1946年3月，是北韓勞動黨領導下由作家、藝術家組成的全國性的社會團體，簡稱“文藝總”。它的任務是貫徹北韓勞動黨的文藝政策，組織和指導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學習和創作，培養新生力量，進行國際間文化藝術的交流活動。同年，金日成指出了“文學藝術應當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方向，以後的各個時期，北韓勞動黨都為文藝工作制訂了方針和政策。

分的檢閱，作品內容上基本是要符合這一時期北韓以階級鬥爭和建設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治意圖的。

在文學交流方面，亞非作家會議為“十七年”時期中國和北韓作家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契機，使中國主流作家和譯者可以更多地接觸和了解到北韓文學，並由此開展北韓文學的譯介活動。第一次亞非作家會議1958年10月7日在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召開，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周揚為副團長的作家代表團出席會議。此後，直到“文革”前夕，1966年6月28日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召開為止，在這數十餘年間，中國作協一直與包括北韓在內的亞非國家的作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互相關注著各國之間文學的動向。崔榮華作為北韓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1963年7月率領北韓作家代表團出席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召開的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執行委員會會議，會後曾來中國進行訪問。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在50年代後期到60年初期曾出版發行過名為“亞非現代文學作品”的譯介亞非國家文學作品的系列叢書，在這套叢書中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有5部，其中就包括崔榮華的詩集『火炬』。

5. 譯介的傾向

1949年10月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毛澤東（1942）的『講話』精神被反復闡述，並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普遍認同，成為指導新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開展文藝批評時應該以“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等『講話』精神作為基本文藝指導思想地位的確立，對“十七年”時期的文藝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文藝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更加密切。

在這一文藝方針的指導下，相比“五四”以來“啓蒙”話語下形成的自由開放的譯介熱潮，建國後“十七年”時期的譯介整體上受到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約束。具體來看，在“十七年”時期的北韓文學譯介中，一方面，政治意識形態占有絕對的話

語權，而政治決策上的激進，使得在譯介活動充斥著“左傾”的意味。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啓蒙”話語中所主張的“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傾向雖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延續，但在政治意識形態的話語下發生了變化，被稱作“弱勢民族文學”。因此，本文將從“左傾文藝”和“弱勢民族文學”這兩個方面來說明“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譯介活動的傾向。

1) 左傾文藝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確立，人民內部矛盾成爲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文藝領域也應當做出相應的調整，因此，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²⁰，“雙百方針”的出台爲文藝創作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間。然而，1957年6月發起的“反右運動”使得“雙百方針”失去了其應有的指導作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社會主義總路線，開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政治路線的確立使得文藝政策開始轉變，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必須政治掛帥”，文藝領域也開始了“左傾”冒進的文化大躍進運動。²¹1962年出台的“文藝八條”²²在一定程度起到了克制“左傾”文藝氣焰的作用，但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1962)以後，政治方向上的“左傾”進一步加劇，以及隨後1963年和1964年毛澤東先後對文藝界做出了『兩個文藝批示』²³的要求，使得文藝指導思想更加激進，形成所謂的“左傾文藝”。這種文藝傾向同樣影響到“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的譯介。

從30年代開始，包括韓國文學在內的譯介活動一直持有譯介“左翼文學”的主

20) “雙百方針”是指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的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方針。具體地說就是，在文藝創作上，允許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題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時存在，自由發展；在學術理論上，提倡不同學派、不同觀點互相爭鳴，自由討論。

21) 葛付英，《“十七年”與新時期文藝政策研究》，齊齊哈爾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16頁。

22) “文藝八條”是指〈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1962年4月30日由中共中央文藝部黨組和中共全國文聯黨組聯合提出，經中共中央批准轉發全國貫徹執行的一個文件。文件針對當時文藝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八條意見。

23) 『兩個文藝批示』是指毛澤東1963年12月12日關於藝術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給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彭真、劉仁的批示和1964年6月27日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案)』上的批示。

張，這與當時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有著重要的關係。直到建國前，都有大量的帶有“左翼文學”色彩的韓國文學作品被譯介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下的政治意識形態無疑為“左翼文學”譯介活動提供了更好的發展空間，然而，隨著“左傾”思想的擴大化，與之相對應的“左傾文藝”主張在譯介活動中占據了指導性的地位，卞之琳(1959)在總結這一時期譯介活動的〈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一文指出：

“也正是在這個總方向引導下，我們拋棄了資產階級學者‘為學術而學術’的道路，開始使研究工作聯系實際，為社會主義服務，面對人民大眾：我們不再鑽牛角尖，不再埋頭於瑣屑無聊的考據，而是探討文學史上的重要現象、重要問題。”²⁴⁾

包括譯介在內的文學活動本應該是在自由開放的話語下進行的，但是，“十七年”時期在『講話』方針的指導下，譯介活動拋棄了“為學術而學術”的道路，開始將重心轉移到為社會主義服務。換句話說，也就是譯介活動從屬於政治，相對於文學性，政治意識形態在譯介活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所以，在“十七年”時期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中，從表面上來看，“左翼文學”是占據優勢的地位。韓雪野、李箕永、李北鳴、宋影、樸世永等作家的作品被大量譯介，其中，韓雪野為這一時期譯介作品最多的作家。這些作家都曾參加過韓國無產階級藝術同盟——卡普，是“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家，有的作家甚至是卡普的創始人和領導人，如李箕永。但實際上，一部分的原著在創作時，就已經帶有明顯的“左傾”的政治意識形態，超出了“左翼文學”的範疇，這與當時北韓的文化政策有著直接的關係，1951年發表的〈金日成將軍致全體藝術家的激勵講話〉中指出“作家不僅要在文學作品中描寫美帝侵略者狡猾的一面，更不要忘記美帝侵略者暴虐、醜陋、野蠻的一面”²⁵⁾，在這種文藝思想指導下，作家在創作作品時，帶有

24) 卞之琳 葉水夫 袁可嘉 陳棨，〈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文學評論》第5期，1959年，15頁。

25) 金日成，〈全體作家藝術家들에게 주신 金日成將軍의 激勵의 말씀〉，《문학예술》제4권 제3호，1951年，8頁。

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正反面人物成爲意識形態鬥爭下的政治符號，而韓雪野的『狼』、李鍾淳、崔健的『不能再過那種日子』、洪淳哲的『阿媽妮』等作品都是根據這次講話而進行創作的。

受到“左傾文藝”思想的影響，“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活動，以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想爲基礎，相對於文學性，文學創作更注重政治性。因此，這一時期的北韓文學作品譯介活動，不僅在選擇作品時，以表現階級鬥爭的譯介作品爲主，而且在譯介作品時，從譯介用語到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改寫，都表現出明顯的“左傾”的文藝思想。

首先，譯介北韓文學作品時，譯介用語十分激進，在譯本的序文中高頻率地出現“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匪幫”等字樣，將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最大化。例如，在『不能再過那種日子』的序文中，譯者寫道：

“過去，農民們在美李統治下的南朝鮮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他們獲得了解放，分得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並積極支援前線。在人民軍暫時的戰略撤退時期，這個村子又陷入敵人的魔掌，美國強盜和李承晚匪徒大量屠殺人民；同時，遊擊隊也展開著激烈的活動。同時，遊擊隊也展開著激烈的活動。不久，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反攻，重新解放了這裏，農民們懷著無限的歡欣和感激迎接新的幸福的日子，並投入了恢復、發展戰後人民經濟的鬥爭。”²⁶⁾

文中將美國比作強盜，稱李承晚政府爲匪徒，潛意識中把他們視爲對立的集團。在譯者看來，美李統治下的南朝鮮人民的生活是暗無天日的，如魔鬼般屠殺人民。而相反，中國和北韓的人民解放軍則是給人民帶來幸福的力量。這種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敘述，對中國讀者而言，在當時“左傾”思想的氛圍下，起到了強烈的政治宣傳作用，是對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必須政治掛帥”的實踐。

其次，譯介過程中，爲了突出塑造正面人物，醜化敵人形象，譯者對原著進行了多處的改寫。例如，在『密林的歷史』中，塑造正面人物時：

26) 李鍾淳 崔健，冰蔚譯，『不能再過那種日子』，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1頁。

原文：

대원들은 영춘의 어깨를 두드린다,
밀림은 아무 일도 없었다는 듯
바람결에 산새 소리만 들려오는데
장군이 기다리실 밀영을 향하여
그들 모두는 걸음을 재촉한다.

譯文：

隊員們拍了拍永春的肩膀，
接著出發返回根據地；
因為將軍正在那裏翹首企望，
全體隊員快步如飛。²⁷⁾

原文中描寫北韓抗日遊擊隊員們爲了盡快與金日成的部隊盡快會合“그들 모두는 걸음을 재촉한다”(他們加快了步伐)，但是在譯文中，這一部分被譯爲“快步如飛”。明顯可以看出，譯者在有意地改寫原文來表現遊擊隊們行動上的身手敏捷、英勇矯健，以及與將軍一同作戰的迫切之情。

同樣還是在『密林的歷史』中，比起正面人物，對於反面人物改寫的幅度則更大：

原文：

어느 것이나 『대일본』이 붙은
씩어 빠진 『회』의 이름을
어깨에 메고 갈광대는
왜놈 남녀들의 게다작 소리

譯文：

到處張貼著“大日本”的名字，
到處打著“大日本”的腐爛招牌；
那些男男女女的日本鬼子，
橫行霸道，狗樣地狂吠。²⁸⁾

27) 樸世永, 李佩綸 楊永驄譯, 『密林的歷史』,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78頁。

28) 樸世永, 李佩綸 楊永驄譯, 『密林的歷史』,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66頁。

原文中描寫在日本侵占後的城市街道上，到處可見日本人和日本公司，到處都是“왜놈 남녀들의 게다짝 소리”(日本男女的木屐聲)。對於這部分內容，譯者根本沒有按照原文進行翻譯，而是改譯成“橫向霸道，狗樣地狂吠”，刻意地突出了侵略者的肆無忌憚、蠻橫無理的醜惡嘴臉。以上譯介過程中，對正反面人物進行的改寫，實際上是受到了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尤其是50年代中期以後越來越偏激的“左傾文藝”理論的影響。

2) 弱勢民族文學

“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作品的譯介活動延續了30年代以來在譯介韓國文學作品時所主張的“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傾向，但在這種傾向的基礎上又發生了變化，本文將其定義為“弱勢民族文學”的譯介傾向。具體來講，“弱勢民族文學”的概念是對20世紀初期開始，由陳獨秀、魯迅等現代知識分子在現代啓蒙話語中所使用的“弱小民族文學”概念的沿用和改造。它是指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中相對於英、法、德、美等西方強勢民族文化的文學而言，在現代世界歷史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特別是處於(或者曾經處於)被殖民地地位的民族文學，在20世紀下半期的外國文學翻譯史中，它又以一種變體形式得到延續。²⁹⁾

“十七年”時期譯介活動中主張的“弱勢民族文學”不再是“弱小民族文學”話語下以他國被侵略的經驗來激勵國人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而是爲了增進與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間的了解和友誼，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文化交流，卞之琳(1959)在〈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

“我們現在翻譯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學作品和過去進步翻譯界的介紹東歐被壓迫民族，在意義上，也有了變化，現在，這是爲了增進我們兄弟國家人民之間的友好團結，在我們新的文學創作中交流經驗。而過去主要卻是爲了這些民族和人民同我們一樣處在被奴役壓迫的地位，希望了解他們爭取獨立解放的願望和鬥爭。我們的優良傳統的這一個方面，現在在一定意義上，就發

29) 宋炳輝 呂燦, 〈20世紀下半期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及其影響〉, 『中國比較文學』第3期, 2007年, 56頁。

揮在我國翻譯界對於亞、非、拉丁美洲文學的重視上。今日，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鞏固世界和平，破除歐洲文化中心說的蒙蔽，也都關涉到這方面工作的開展。”³⁰⁾

因此，在中國建國後的“十七年”期間，對於亞非拉弱勢民族文學的譯介成果尤為顯著，特別是50年代後期以來，出現了譯介亞非拉國家文學作品的熱潮。先後出版了35個亞非拉國家的文學作品，而其中譯介最多的就是越南和北韓。此外，《譯文》雜誌在1958年第9、10兩期連續推出了“亞非國家文學專號”，11月號又設有“現代拉丁美洲詩特輯”。1959年《譯文》雜誌更名為《世界文學》，同年2月號上主要刊登的就是亞非拉文學的翻譯，4月號則又開闢了“黑非洲詩選”欄目。作家文學出版社也在這一時期，出版了名為“亞非現代文學作品”的系列譯介叢書，這套叢書譯介了亞非現代文學作品29部，其中包括北韓文學作品5部，占總數的六分之一，可見北韓文學作品在“弱勢民族文學”這個譯介話語中被重視的程度。

作為“亞非現代文學作品”系列叢書一部分，由作家文學出版社發行的這5部北韓文學作品分別為：

千世峰，『白雲繚繞的大地』
趙白嶺，『紅色宣傳員』
李東春，『回聲』
樸世永，『密林的歷史』
崔榮化，『火炬』

其中，千世峰的『白雲繚繞的大地』是一部中篇小說，由冰蔚、沈聖英、文公翻譯，小說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韓國元山總罷工為背景，講述了1920年代懷揣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主人公們逐漸成長為新生力量，聯合工人階級一同罷工抵抗日本殖民統治，後來被迫流亡到滿洲，參加金日成領袖領導的抗日遊擊隊，積極開展抵抗日本敵人的遊擊鬥爭，最後建立起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故事，表現了

30) 卞之琳 葉水夫 袁可嘉 陳棗，〈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文學評論》第5期，1959年，47頁。

北韓人民在保衛祖國戰爭中堅強不屈的獻身精神。趙白嶺的『紅色宣傳員』和李東春的『回聲』是兩部以北韓千裏馬運動為寫作背景的戲劇。『紅色宣傳員』由張琳翻譯，劇中的主角李善子，在北韓勞動黨的總路線——“千裏馬運動”³¹⁾，“青山裏”精神³²⁾的指導下，以身作則，用自己的模範行動來感動、幫助和改造落後的李善福、崔官弼和崔鎮午，使被改造了的人又去參加幫助別人的改造，從而形成了一股波瀾壯闊的群眾互相改造與自我的改造的巨流。³³⁾『回聲』由周必忠誠翻譯，描寫的是一個復員回鄉的軍人在朝鮮勞動黨黨組織和群眾的支持下，克服種種困難，征服荒山，增加糧食生產的故事，作者運用喜劇形式，反映了先進思想與保守思想的鬥爭，歌頌了跨上千裏馬的山區農民響應朝鮮勞動黨的號召，不斷革新，不斷前進，改造大自然的革命鬥志。³⁴⁾樸世永的『密林的歷史』和崔榮化的『火炬』是兩部詩集。『密林的歷史』由李佩綸、楊永駿翻譯，是一部長詩，反映北韓人民敬愛的領袖金日成同志領導的抗日武裝鬥爭。『火炬』由張琳翻譯，是一部詩集，收錄了〈黨的呼吸〉、〈偉大的愛〉、〈火炬〉、〈千裏馬嘯，朝鮮的氣概〉、〈祖國嘯，隨著時間的前進〉、〈社會主義的歌手〉、〈心驕〉、〈鋼〉、〈熔爐工人的心〉、〈月夜〉、〈工程師〉、〈你的心意我領情〉、〈在新年〉、〈千裏馬的氣勢〉、〈審判〉、〈你們再也賴不下去了〉、〈在祖國地圖的前面〉、〈不眠的夜〉、〈斬斷你們的命脈〉、〈人和田野充滿活力〉、〈新春在天地間展翅飛翔〉、〈黎明〉、〈土地〉、〈秋天的田野〉、〈重返家園〉、〈他沒有死〉、〈勝利之夜〉、〈一路平安〉、〈印度尼西亞〉等29首詩，從各個方面表現了北韓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除〈火炬〉、〈千裏馬嘯，朝鮮的氣概〉、〈印度尼西亞〉三首外，都譯自崔榮化的詩集『翅膀』。

可以看出，在“弱勢民族文學”的譯介傾向向下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有別於30

31) “千裏馬運動”(천리마운동)是北韓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1956年12月，為積極促進北韓社會主義建設，金日成主席發出了“以跨上千裏馬的氣勢奔馳”的號召。“千裏馬運動”由最初的工業部門擴展到農業、交通、文教等部門，成為整個社會的勞動競賽運動。

32) 1960年2月，北韓金日成主席到北韓北部平安南道江西郡的青山裏農業合作社進行調查。根據這次調查研究，他針對北韓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情況，提出了一整套的革命性的措施。在金日成主席的這一指示下，北韓廣大群眾積極有力地推動了北韓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這一指示被稱作“青山裏”精神和“青山裏”方法。

33) 趙白嶺，張琳譯，『紅色宣傳員』，作家出版社，1963年。

34) 李東春，周必忠譯，『回聲』，作家出版社，1964年。

年代所譯介的“弱小民族文學”的作品。上文所提及到的北韓文學作品，在主題上更多的傾向於表現北韓人民克服困難，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樂觀態度，反映了北韓勞動黨的總路線——“千裏馬運動”，“青山裏”精神和“青山裏”方法。而不是停留在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韓半島人民所受的壓迫，以及沖破這一枷鎖的抗爭的精神。趙白嶺在『紅色宣傳員』的序文〈爲了忠實地反映黨的政策〉中寫道：“關於話劇『紅色宣傳員』，可以概括爲一句話：它是在貫徹首相同志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對作家藝術家的指示的過程中取得的收穫，是蓬勃發展的千裏馬現實生活的產物。”³⁵⁾

在“十七年”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確立，當時的首要任務是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在“弱勢民族文學”的譯介傾向下，譯介能夠反映北韓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學作品，對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創作和社會主義建設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6. 結語

“十七年”時期的文學活動帶有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在毛澤東『講話』思想的指導下，“文學從屬於政治”成爲這一時期的文學規範。受到50年代中後期政治上“左傾”冒進運動的影響，文學活動也變得激進起來。這種趨勢同樣影響到這一時期譯介活動。

“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的譯介活動是在冷戰時代話語下進行的。首先，從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這一時期北韓文學的譯介活動得到支持和鼓勵，而韓國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被完全地禁錮了起來。其次，在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中，大部分都是30年代以來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但由於受到金日成講話的影響一些作品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冷戰政治意識形態的傾向。

在總結“十七年”時期的北韓文學譯介活動時，可以看出，相比建國前韓國文

35) 趙白嶺，紫荊譯，〈爲了忠實地反映黨的政策〉，『紅色宣傳員』，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1頁。

學譯介活動中存在大量的重譯現象，這一時期，譯者能夠直接通過韓語文本進行譯介活動，這一點上無疑大大提高了譯文的準確度，也避免了因受到其他重譯國家文學話語影響，而造成對原著認知上的錯位。

但是，在『講話』思想指導下，“十七年”時期北韓文學作品的譯介活動，以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受到了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一方面，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增進同亞非拉國家的了解，譯介“弱勢民族文學”的主張受到認可，大量的亞非拉國家的文學被譯介到中國，而北韓既是亞非拉國家的一員，同時又在韓國戰爭中與中國結下了深深的友誼。在這一時期譯介的北韓文學作品體現了北韓建設社會的“千裏馬”運動和“青山裏”精神，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夠起到鼓舞的作用，所以，作為“弱勢民族文學”的一部分，北韓文學作品被譯介到中國無可厚非。另一方面，隨著政治上“左傾”思想的高漲，譯介活動無法避免其所帶來的影響。在“左傾文藝”思想的指導下，文學不僅從屬於政治，更要突出階級矛盾的典型性，所以，在這一時期北韓文學作品的譯介活動中，為了加深對原著正面人物的美化和反面人物的醜化，也存在著譯者有意對原著改寫的現象。

作為中國文學活動一部分的北韓文學譯介，在“十七年”時期雖然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嚴重干涉，文學性的比重明顯下降，但也不乏一些能夠代表北韓文學的主流作品被譯介到中國。重新審視這些作品，分析這一時期的譯介，不僅可以了解到當時中國譯者企圖通過譯介北韓文學作品來觀照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化心理追求，同時也可以看出在當時冷戰時代話語影響下，北韓文學也表現出強烈階級鬥爭意識，與當時的中國一樣將文學發展成爲一種國家敘事。

〈參考文獻〉

- 韓雪野，李烈譯，『大同江』，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
李東春，周必忠譯，『回聲』，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李鍾淳 崔健，冰蔚譯，『不能再過那種日子』，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
馬祖毅，『中國翻譯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樸世永,李佩綸 楊永驩譯,『密林的歷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 錢鍾書,『舊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蘇聯人民的文學』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
- 王志宏,『翻譯與文學之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和提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
- 趙白嶺,紫荊譯,『紅色宣傳員』,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
- 趙白嶺,張琳譯,『紅色宣傳員』,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 周發祥,『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 朱棟霖,『中外文學比較史(1949-2000)』下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 정병욱,『국문학산고(國文學散稿)』,서울,신구문화사,1959年。
- André Alphons Lefevere,『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
-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崔京花,〈試論朝鮮韓國文學的概念及其文化審美特征〉,『求知導刊』第20期,2015年。
- 崔雄權,〈試論韓國朝鮮文學的概念及其文化審美特征〉,『東疆學刊』第3期,2009年。
- 卞之琳,〈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文學評論』第5期,1959年。
- 卞之琳 葉水夫 袁可嘉 陳棻,〈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文學評論』第5期,1959年。
- 葛付英,〈“十七年”與新時期文藝政策研究〉,齊齊哈爾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 韓雪野,冰蔚譯,〈解放以來的朝鮮文學遍地開花(特約稿)〉,『世界文學』第8期,1960年。
- 金鶴哲,〈建國三十年朝鮮和韓國文學譯介研究〉,『東疆學刊』第1期,2017年。
- 金一,〈韓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出版現狀綜述〉,『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4期,2013年。
- 黎躍進,〈亞非作家會議的民族主義主題〉,『燕趙學術』第2期,2009年。
- 李金樹,〈“十七年”(1949-1966)翻譯研究:回顧與展望〉,『外國語文研究』第3卷第3期,2017年。
- 李松,〈建國後十七年外國文學經典的翻譯標準〉,『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8年。
- 林紹綱,〈亞非作家會議始末〉,『紅岩春秋』第5期,2006年。
- 劉立勝,〈翻譯規範與譯者行為關係研究的社會學途徑——以晚清與建國後十七年間文學翻

譯爲例), 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2年。

宋炳輝, 〈弱小民族文學的譯介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 『中國比較文學』第2期, 2002年。

宋炳輝 呂燦, 〈20世紀下半期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及其影響〉, 『中國比較文學』第3期, 2007。

鄭晶, 〈建國十七年朝鮮文學翻譯中的意識形態改寫現象研究〉, 『東疆學刊』第1期, 2018年。

〈Abstract〉

A Study of North Kore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during the “17-Years” Period in China

Sun, Ji / Roh, Jung-Eun

The “17-Years” period after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eve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e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are not as blank as most scholars think, bu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During the “17-Years” period of translation,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Korean literary works. Studying these work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perception of Korea at the time. But due to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this period,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se literary works wa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North Korea literary works in the same ideological camp were translated into large numbers. On the contrary, South Korea literary works in the hostile ideological camp were completely banned.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in the Kore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ranslator can directly translate the Korean texts, which undoubtedly greatly improved the accuracy of translation and avoided Influenced by literary discourse in other translation countries. But under such

strong ideological intervention, what kind of tendency does the translator have in translating Korean literary works, and how this translational tendency will affect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This article will reorganize the status of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ry works during the “17-Years” period, and attempt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way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Translation, “17-Years” period, North Korean literature, political ideology, Vulnerable nation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10일에 접수되어 2019년 11월 7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9년 11월 18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